

# 我国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当下反思

牛俊伟

(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引发了人们对于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广泛讨论,但这些讨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做法。因此,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溯问题的缘起,澄清主体性概念的内涵,探索激发主体性的途径,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农民; 主体性; 反思; 问题缘起; 市场经济;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D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5-0013-0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这不仅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再一次强烈关注,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纷纷展开热烈的讨论,各种文章屡见报端,一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但热议的激情不能取代冷静的反思,如果没有对一个问题深邃思考,那么热情终归会因缺乏底蕴而枯竭。

## 一 对问题缘起的反思

笔者研究发现,人们对新农村问题的关注越来越集中到一个共同的话题上,那就是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在讨论中人们日渐达成一种比较普遍的共识:能否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正如朱国城指出的:“培育农民主体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如果不着力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激发蕴藏在亿万农民中的巨大潜能和无限创造力,再好的优惠政策,再多的人财物力支持,也只能起到暂时的‘输血’功能。而只有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快速、健康发展。”<sup>[1]</sup>但为什么对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会越来越从最初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注转向对农民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呢?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少有人思考。笔者以为这并非是个不证自明或无需解答的问题,它恰恰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合理走向的前提性问题。

要回答农民的主体性问题的缘起,我们唯有重温历史,以历史的厚重来夯实理论的轻浮。笔者以为:弘扬主体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洋务运动”。洋务派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兴办新式企业以救亡图存,但由于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经济层面或器物层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有鉴于此,随后的维新派把单纯的经济革新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动了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以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但也不过维新了百日便寿终正寝。两次失败终于促使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不从根本上变革文化传统,改造国民性,就无法真正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于是就催生了以弘扬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主体性、再造新国民,人被最终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二)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上演了相似的一幕,文革结束之后我们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航程时,改革开放再一次把人的问题提了出来。最初的改革仍然是从经济层面开始,先农村后城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之进一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最终又指向了文化传统,因为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支配下的中国民众民主意识淡漠、血缘乡土情结浓厚、封闭保守依赖畏惧思想严重,在基本素质和行为方式上还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要求,于是又一轮以人的主体性为旨归的“文化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粉墨登场,这成为后来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前导。

(三)20 世纪末期,随着文化讨论的深入开展和西方工具理性的肆虐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以主体性已异化为反主体性为由,逐渐认同了多尔迈“主体性黄昏”的观点,开始接受以消解主体性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一度撤离以人之主体性生成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收稿日期] 2009-08-16

[基金项目] 漳州师范学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我国农民主体意识问题研究”项目资助(编号: ss07020)

[作者简介] 牛俊伟(1978-),男,内蒙古卓资县人,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展,特别是新世纪新农村建设提上日程以来,“三农”问题已从经济层面经由政治层面,跃升到文化层面,再一次把人的主体性问题凸显了出来,关于农民主体性的讨论之热烈当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继续。

中国近代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终总是会聚焦于人的问题上,而人的问题最终又落实到文化现代化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这一任务能否最终完成,关键取决于亿万中国农民能否真正作为主体,是否能在建设新农村实践过程中激发出主体性。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不能仅仅依靠制度层面(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就能实现,文化现代化仍然是不能回避的艰巨任务,这也正是当前农民主体性研究勃兴的根本原因,对其重大意义,黄琳做了科学的说明,他认为:“理论上,其一,对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是人学向纵的方向深入的要求。以前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多停留在类这一层面的宏大叙事上,对某一阶层尤其是农民这一历时最久占当今人口最多的群体的主体性研究目前还没有。至于从现代性的视角研究农民的主体性的文献更未见到。其二,现代化理论深入探讨的需要。目前对现代化的研究历经器质——制度——人,这是对现代化认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可喜进展。在既有的成果面前,不止步于抽象的人,对于农民的主体性的研究将深化现代化的研究。”<sup>[2]</sup>

## 二 对核心概念的反思

激发和弘扬广大农民的主体性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究竟什么是“主体性”,农民“主体性”有着怎样的内涵,在目前的讨论当中,恰恰显得较为混乱,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主体性概念的模糊看法。大致来看,人们主要是在两个维度上使用主体性概念:

一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把主体性直接等同于农民的主体作用、主体地位和主体力量。如赵金瑞等就指认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本质特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以不同方式掌握客体所显现出来的功能特点。”<sup>[3]</sup>还有的文章不加任何界定直接探讨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力量,笼统的主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力量,认为农民的主体力量就是指“农民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积极主动地投入建设并在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sup>[4]</sup>

二是从主观精神层面把主体性直接等同于农民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和主动性。如伏春兰就认为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具体包括农民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作者对这些特点的解释却主要集中于从主观意识方面加以把握,主体性变成了“强烈的进取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革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等<sup>[5]</sup>。

笔者以为:农民主体性是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因此,不首先搞清楚人的主体性的真实内涵是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清楚农民主体性的。

(一)主体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哲学(人学)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在哲学上,主体(subject)是相对于客体(object)而言的范畴。从整体上看,‘人始终是主体’,‘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作用于客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sup>[6]</sup>也就是说,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不等于主观随意性,客体性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对主体性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当前在农民主体性的讨论当中,恰恰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客体制约性,只讲主体性,把主体性直接指认为农民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片面强调他们的自主、自决、自为和创新意识,进而一般性地主张提升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主体作用和主体力量。功能至上主义的必然后果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农业“卫星”满天飞就是把主体性绝对化了的恶果。而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乡镇企业畸形发展,只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度放牧,滥砍滥伐,毁田污河等极端行为。可见,无视客观现实,不尊重规律,主体性必将走向它的反面——反主体性。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当中,当然要激发广大农民的主体性,但如果从一开始就对主体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话,很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马克思主义对于主体性原则的阐发是充满辩证精神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7]</sup>马克思既批判了以往的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客体性,又批判了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主体性的双重缺陷,在实践的基础上既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又强调了社会实践的制约性,把主体性原则置于主客体相互制约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从而把主体性原则升化到了新高度。片面强调客体,在哲学上就会倒退到机械唯物论,在实践中淹没主体,导致虚假集体主义;片面强调主体,在哲学上就会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出现主体的异化,导致极端个人主义。

(三)主体性内涵是一个“一体三性”的整体结构。所谓的“一体”当然是人,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sup>[8]</sup>,但人和主体并不能直接等同,这就涉及到主体的“性”,因为只有具备主体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体。所谓的“三性”实际上是人的活动的三个维度,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 and 他人)、人与自我三个领域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质的规定性。具体来说,一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应中具有能动性,不为自然客体所束缚而能够能动的认识和改造自然;在人与人(社会 and 他人)的关系中应具有自主性,不为别人主宰而能够独立自主的进行平等交往;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应具有自为性,不为我狭隘意识所封闭而能够自觉自愿提出正当合理需要并能满足自己的

需要。对于今天的农民来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先后经过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战天斗地”的洗礼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锤炼,农民的能动性显然有了重大的提升,甚至还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但在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显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表现在城乡交往中农民的矮化,公共决策中农民的缺席,利益表达中农民的失语等。可见,主体性的内涵是一个圆融饱满的整体,如果流于对主体性作大而化之的讨论,势必影响我们对农民主体性的科学分析,显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课题。

### 三 对解决路径的反思

理论最终都要回到现实中来,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是我们所有关于农民主体性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们对当前农民的主体性缺失现状有着较多的认同,对解决的路径也给出了多样的答案。但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对缺失原因的讨论既然没有切中要害,那么提出的方案当然也就难有现实针对性。

归纳起来看,人们往往一般性地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政治方面主要是现有的某些制度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在某些方面不尽完善或不合理,无法为农民主体性的正常发挥架设适当平台;经济方面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对立,农业基础薄弱等制约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文化方面主要是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传统的小农意识浓厚等有碍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此相对应的主要解决办法也主要集中制度保障、物质支撑、素质提升这三方面:一是创新制度建设,尊重农民权益,理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二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物质基础;三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全面开展对农民的文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弘扬先进文化,培育主体精神。说来说去不过是显性层面的多重复述,无法从深层开出治本的药方,而且更为致命的是,这些解决路径中暗藏着一个悖谬的逻辑,那就是仍然把农民置于客体地位,不是当作主体,而是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来对待,一概看不到农民本身应该怎么做,只是关注于从外部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这仍然是以地道的客体主义逻辑来解决主体性的问题。

笔者以为,既然主体性是在主客体相互制约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特质,那么主体性的缺失和匮乏,也就不可能由单一因素造成,我们应当从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予以深度解读,从中探求解决之道。

(一)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工业文明的立根基础无疑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而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活动还主要是局限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广大的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经济,即使有一定的商品经济,那也仅仅是局限于日常生活用品贸易的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城乡

差别和区域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是一幅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双重转型共时态交叉进行的复调图景的话,那么这幅复调图景在区域上大致可以分别对应乡村和城市这两极。易言之,当市场经济在城市生活中日益成为主导,社会活动主体开始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活动方式,通过接受现代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而由自在自发走向自由自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现代实业家为主体,逐步形成了相对自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理性的、科学的、契约的、主体性的人格已然确立,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城市经济决策的理性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与公开化、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法制化,甚至在某些发达区域还程度不同的显露了工具理性过分张扬而导致的反主体性现象,并早早的迈开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步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市场经济还处于萌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亿万农民尚没有从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自然经济和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仍然习惯于凭着经验传统常识而自发地生存与活动,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农村整体上落后于城市的状况。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们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试图组织农民,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理性指令和计划运行的自觉的王国,实际上不过是以虚假的集体主体代替了自在的个体主体,真正的农民主体仍然淹没在过分强大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绝对政治权威的管制下。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改革曾一度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对土地的渴求一旦得到满足,温饱问题成为历史记忆,“小富即安”的盘算却再一次扼杀了主体自觉的萌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这次改革在本质上不过是由过分超前的集体经济切合实际地重新退回到了小农经济,而远非前进到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广大农村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超越农业文明形态,只是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市场经济由城市向农村的进一步深化扩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就不能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沉重结构,当然更不能催生主体自觉的现代农民,新农村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按照衣俊卿的说法,小农经济是一种“无主体”的经济,仅凭借经验和习惯就能开展活动,对人的主体性要求不高,相比之下,市场经济恰恰就是一种“主体经济”,市场瞬息万变,单凭经验和习惯显然不能凑效,因而对人的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要求极高,活动主体必须具有创新、契约、竞争、平等现代性意识<sup>[9]</sup>。因此,农民主体性的激发就在于农民自己抛开小农经济的羁绊,勇敢走向市场,积极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通过市场经济的淘洗方能褪去那层古老而坚硬的奴化外衣。

(二)当然,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并不能单靠市场经济的实践自发催生,还必须通过文化整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才能成功。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发展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受到深

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民群体之所以长期处于主体性缺失状态,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模式束缚之外,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与农耕经济相适应,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自然无为、释家的寂然出世为主体,它主要通过道德修养的内在功夫,实现直觉顿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我国古代这种内敛无为忘我的致思路径折射出古代中国专制政治、愚昧迷信、封闭压抑下人性的一种无奈表达,深刻的影响着国民的心理和人格,经过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它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摆脱。虽然在 20 世纪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 80 年代的“文化热”两次文化启蒙,但终究因为局限于纯粹的思想观念,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深层文化机制——强大而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除了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外,并未促使普通民众从自在自发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以人之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文化模式转变。如果说随着城市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市民阶层开始从传统的哲学精英文化和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已形成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引导下相对独立、自律地、多元地开展社会活动,并以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渐将精英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边缘化。相比而言,在今天的广大农村,虽然人们的行为模式仍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层制约,但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中却处于一种无根的混乱状态,古老的宗族文化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断裂早已荡然无存,而无产阶级的无神论运动又把传统的民间信仰摧毁得不再完整,倒是城里的大众文化时不时的撩拨着农民窥视外面世界的心灵,漂浮无序的文化状态严重制约着农民独立个性和健康人格的生成,无法塑造出建设新农村所需要的现代新型农民。为此,我们的哲学理性或精英文化就决不能因为大众文化的排挤退守书斋孤芳自赏,更不能简单的同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平

面文化模式认同,当务之急无疑是要重新反思文化启蒙,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思想观念的文化教化,而应自觉放下“曲高和寡”的精英身段,在当前农民精神文化状态处于漂浮无据的空场之下,勇敢直面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对接,变居高临下的外部精神启蒙为平等对话、共生共栖、融通整合的文化创新,引导自觉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向农民日常生活世界渗透,促使内在于普通群众中各种具有现代主体特征的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因素走向自觉和觉醒,让广大农民在吮吸新鲜血液从而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自我蜕变。

#### [参考文献]

- [1] 朱国城. 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J]. 学术研究, 2007(7): 79.
- [2] 黄琳, 刘翠玉. 现代性视角中的农民主体性导论——问题的提出、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历史及现状[J]. 前沿, 2008(4): 91.
- [3] 赵金瑞, 袁小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培育研究[J].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2007(9): 84.
- [4] 蔡晓辉. 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J]. 河南农业(教育版), 2007(7): 16.
- [5] 伏春兰.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及其作用[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6(5): 76.
- [6] 孙绪民, 桑爱友.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之考量[J]. 调研世界, 2007(7): 3.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9] 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Current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hinese Farmer Subjectivity

NIU Jun-wei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have happened since our country decided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owever,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problem has been simplified in these discussions. Therefore, i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to further clarify series of problem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Key words** farmers; subjectivity; reflection; origin of topic; market economy; cultural innovation